

科学研究文集

西北師範學院編印

1956年7月

目 錄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	胡國鈺·李秉德 (1) 刘問岫·陈大白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批判·····	李化方 (10)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	李明經 (18)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教育思想·····	周毅成·黄学溥 (29)
心理学的对象及其体系·····	王文新 (33)
教育的起源·····	陈震东 (53)
高中語文古典教材注釋方法商榷·····	彭 鐸 (83)
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及其分期·····	刘熊祥 (87)
學習列宾和列宾的技法·····	呂斯百 (107)
敦煌壁画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試論·····	洪毅然 (118)
对洪毅然先生“敦煌壁画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試論”一文的商榷·····	陈守忠 (137)

附 錄

學習列宁的樸素作風·····	徐福夫 (143)
馬克思主义是正確的是万能的·····	徐福夫 (146)

學 術 動 態 編 者 的 話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

胡國鈺 李秉德

刘問岫 陳大白

美帝國主義為了對中國進行侵略，曾經把它的御用學者杜威等所製造的用以欺騙人民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大力地有計劃地在中國傾銷。在五四前夕杜威來華“講學”就是為的这个目的。而中國的封建階級及買辦資產階級為了反對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並維護其本身利益，對於它主子的這種思想自然頂禮膜拜，奉為救命至寶，於是便由其代言人胡適出馬奴顏婢膝地歌頌杜威，傳播所謂“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杜威的一言一語極盡無恥地大肆吹捧、說什麼“杜威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大革命家”，說什麼他的哲學是“近代科學發達的結果”，希望並斷言杜威哲學在中國“開花結子”。此外在杜威之後又有其伙伴與嘍囉孟祿、推士、麥柯爾、克伯屈、柏克赫斯特及華虛朋等人接踵而來，繼續深入地在教育的各方面（如學制、測驗、教法等）進行毒化工作，而另一方面，反動統治階級又派大批留學生到美國直接販運這種毒品。於是反動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大肆泛濫，使舊中國的教育界受了程度很深的毒化。

在教育思想領域中的鬥爭經常是一種極為尖銳的黨派爭鬥。毛主席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矛頭却正指向着領導人民教育事業的馬列主義教育思想。它的每一個論點都是對准馬列主義教育思想使用的明槍暗箭。因此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存在就必然地對於共產主義教育事業起着嚴重的破壞作用。今天當祖國正以飛快的速度向着社會主義邁進的時候，文教工作者為了自己的工作能與各項社會主義建設及改造事業密切配合，協同前進，首先就必須以馬列主義教育思想把自己真正武裝起來。毛主席又說：“不破不立”，為此，我們就有萬分必要來把馬列主義教育思想的敵人——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加以徹底摧毀。只有把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反動本質及其惡毒影響加以無情的揭露，把它在我們頭腦中的殘余影響加以肅清，或者說只有把這塊絆腳石踢開，我們文教工作者才能夠隨同工農業各部門工作以同樣飛快的速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進大道上奔馳。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理論根據及其反動本質，然後再來看看它在我國教育界所已經發生的惡毒影響。

一、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理論根據及其反動本質

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論根據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主觀唯心論的實用主義哲學。這種實用主義哲學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期的產物。這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已

在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日益深入廣大勞動人民的思想，成為勞動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武器。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者杜威，為了欺騙人民，不敢公開用那久已破產了的唯心主義來反對唯物主義，他企圖以那第三者的姿態用“經驗”這個曖昧的術語來掩蓋其主觀唯心論的反動本質。

雖然玩弄“經驗”這個術語是資產階級一種舊把戲，杜威卻是在教育思想中玩這把戲的第一個角色。杜威曾經給教育下了一個定義，說“教育是經驗底繼續改造或重新組織”。他又說：“教育是以經驗為內容，經由經驗，並為了經驗的目的而進行的”。可見“經驗”一詞在杜威的教育哲學中占着極重要的地位。實際上他確是利用“經驗”一詞行施了他的陰謀詭計。我們必須說，在“經驗”一詞的理解上，我們和實用主義者們是有着原則上的區別的。

馬列主義者並不否認經驗。不過，我們所說的經驗，是人們在生產鬥爭及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它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經驗是以客觀世界為其先決條件的，當然也是以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及其可知性為基礎的。在這裡我們承認客觀世界是本源的東西，而人的經驗則是從屬的東西，不過正因為經驗能以相當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所以人們就能掌握這些規律使其為人類服務，把人類社會一天一天地推向美好的境地。我們對於經驗的這種看法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看法。

然而實用主義者杜威卻完全不這樣看。

杜威為了企圖抹煞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他主觀地把心與物統一於“經驗”這一概念之下。把哲學上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自以為就這樣地可以“不了了之”，並自以為這是超乎所有唯物論與唯心論之上的哲學主張。那麼，杜威所說的經驗究竟是什麼東西呢？他認為世界的一切存在都只是“經驗”，而“經驗本身存在於一個人對於他的自然的環境與社會的環境之間的積極關係”。這就是說，他否定客觀存在是第一性的，主觀意識是第二性的。他說經驗是包括主觀客觀的東西，主觀客觀二者不能分割，事實上，他用一個人的“積極關係”來作標準，這就是十足的唯我論。所以杜威自己的公式是“客觀主義＝主觀主義”，他又說：“每一項經驗有一個主動的方面，在這一方面相當程度地改變此經驗的客觀條件”。這就顯然說明他把主觀作為第一性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更確切些說，經驗並不是客觀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是人們在與環境發生“關係”或“交涉”的過程中的“主動”作用或“積極”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這就等於說“經驗乃是個人主觀上的東西”。杜威就是這樣先用“經驗”一詞去概括心與物，混淆主觀與客觀的界綫，然後再用偷天換日的手法，用純粹主觀唯心論的觀點去解釋經驗。從這裡我們看出，不管杜威怎樣轉彎抹角，不管他使用怎樣的遮眼手法，而在思維對於存在的關係問題上，他在實質上是一個主觀唯心論者。

對於經驗的主觀唯心論的理解下，自然就否認了客觀世界之存在，因而也就否認了客觀真理，所以杜威曾露骨的說：“如果沒有人類對於這些事物的關係和興趣，沒有人類對於這些事物的解說，那麼這些事物也就不是歷史上的事物了”。而胡適也曾荒謬地說，實在好比一百個大錢，任憑我們怎樣去擺布它。又好比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憑我們怎樣去打扮她。天地間既無客觀真理，無所謂規律，無所謂是非，那麼我們就無須去鑽研它，掌握它。只消在每個人的直接經驗的範圍之內去應付環境。能夠應付過去

就算“成功”，这种应付环境“成功”的经验就算“有用”，就算“真理”，这种应付环境“成功”的人就是“有效率的公民”。实用主义者这种做法的卑鄙目的何在呢？它就是企图来证明垄断资产阶级之能够掌握政权，是因为他们能应付环境，是“有效率的公民”，这样在思想上解除劳动人民的武装，使我们在现成的环境面前停止下来，不去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永远安于愚昧，因而也就不会去革命，不会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出，杜威的主观唯心论的反动的阶级本质。

胡适一九一九年四月发表的“杜威的教育哲学”一文，就是这种唯心论的反动。

杜威胡适既然在“经验”一词的幌子下偷运着主观唯心论的反动的毒品，那么，在“教育是经验底继续改造”的这一荒谬的教育定义下所推行下来的一系列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也就不能不是荒谬与反动的。我们现在再进一步看一看，杜威在教育各个问题上是怎样地迷惑人民的。

按照杜威的说法，教育既是经验底继续改造，而经验也只是个人此时此地应付环境的工具。它只是过程，没有目的。那么，作为改造经验的教育除其本身外就不可能有目的或不可能有将来的共同的远大的目的，而只能有无数适应此时此地环境的要求的目的。这就是实用主义教育学者在否定教育目的问题上的謊言。杜威为了想把他这种谬论用“科学”的外衣装扮起来就用庸俗进化论的謊言，不伦不类地把人类的教育过程比作生物的生长过程。按照他的逻辑，既然生物的成长是没有预定的目的的；那么，教育也就不能有预定的目的；生长除本身外无目的，那么教育除本身外自然也无目的了。或者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教育就是生长”。在这里不仅暴露出杜威对于社会科学的歪曲，而且也说明了他对整个人类的任意污蔑。

难道教育真的是无目的么？我们知道，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反映经济基础并为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个武器的作用就看它掌握在谁手里并用用来打击谁。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既然掌握着这种武器，它就决不能不以这种武器为其阶级利益服务。反之，反动统治阶级正是为了使这种武器发挥更大的效能，所以才放出了“教育无目的”的烟幕。期使劳动人民只在眼前生活中打圈子，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途，自无须为将来美好的生活去革命。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可长久维持下去。这就是“教育无目的”的烟幕下的真正目的。杜威的奸计就在这里。

随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日益法西斯化，杜威在他的晚年已经丢掉了他的伪善假面具，不再十分掩饰统治阶级教育的真正目的。他在“人的问题”一书中曾说：“教育是我们政治上求得安全的唯一武器”。又说：“实现社会改革（应该说是“维持现存制度”）的方式，除了暴力外还可以利用其他一类的方法”。他所说的其他一类的方法当然主要是指教育而言。他最后还说：“我们自己也局部地同意那信念，这是说暴力，粗野的生理暴力，终究是最可靠的手段”。从这些话里，我们不仅看穿了杜威的“教育无目的”的说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而且也清楚地看到了杜威把教育与暴力结合的狰狞凶恶的面孔。简直是抛头露面把自己法西斯匪徒的刽子手的本相揭露出来。

胡适就是以杜威的“教育无目的”的主张为其指导思想，在他的“归国杂感”中反对课程的完整性，接着就大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为知识而求知识”，主张“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胡适的这一系列主张大大助长了教育脱离现实

的思想，使許多教育工作者脫離了當前階級鬥爭的實際，實際上盲目地為統治階級利用，而主觀上尚且以“清高”“超然”自賞。

杜威本着他的主觀唯心論的經驗論及庸俗進化論既然得出了“教育無目的”“教育即生長”的命題，那麼要問“生長是為着什麼”？其答案當然就是為着生長主體的本身，樹的生長為的樹，貓的生長為的貓，兒童的生長就是為的兒童本身。由此他又推衍出他的教育上的兒童中心主義，要教師放棄對兒童全面發展的指導作用。他認為過去的教育來自教科書或來自作為成人的教師這是不對的，因為他把經驗作為個人的主觀經驗，否定間接經驗的作用和意義，故他主張把教育的主体放到兒童身上，听其泛濫自流，這就叫做一切以兒童為中心。他說：“兒童變成了太陽，一切教育措施必須圍繞着它而進行”。杜威並且還狂妄地把他這種放棄對兒童的教育說法稱為“教育上的哥白尼革命”。（！）

按着杜威的荒謬說法，既然教育應以兒童為中心，那麼教育的內容就應該是兒童自己的活動，按着杜威對於教育的生物學的曲解，教育的作用只在於發展所謂人所固有的“本性”。所以只要使兒童的自發活動能夠盡情表現出來也就夠了，無須一定要教給他什麼東西。至於兒童的學習方法呢？那也就是對於自發活動的參加，或自發活動過程本身，因為主要的是讓兒童自己去“經驗”，去“繼續改造”他自己的經驗，用杜威自己的話來說，應該“從做中學”。“從做中學”，這就是杜威教學理論的基本原則。杜威就是根據着這個基本原則來建立他的課程論與教學方法論的。

如果只望文生義，不看問題的本質，就有可能把杜威這裡所說的“做”與我們常說的“實踐”混同起來。這樣就要犯嚴重的錯誤。要知道，這兩個名詞的含義是有着原則性的區別的。我們所說的“實踐”，既有理論的指導，又是理論的証驗，它與理論密切結合，螺旋式的上升，使我們對於事物的認識由表及里逐步深入。而杜威所說的“從做中學”的“做”，則是排斥正確理論的指導，使我們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兜圈子，永遠看不到事物的本質。此外，我們所說的“實踐”的內容乃是人們在社會中的生產活動與階級鬥爭。至於杜威所說的“做”，則僅僅是個人的日常事務的處理。所以，在我們的“理論與實踐一致”的指導原則之下，所培養出來的必然是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中有頭腦能行動的戰士。而在杜威的“從做中學”的指導原則下，所培養出來的則只能是些習慣於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只圖眼前小利的鼠目寸光的資本主義的奴隸。顯然，這正是杜威的主子反動的資本家們所希望的。

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的社會階級反動本質，就在於杜威所說的兒童是生活在壟斷資本家統治下的兒童，兒童經驗的內容就是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影響下的直覺反應，所以杜威所說的要尊重兒童的自發活動，“從做中學”，實質上就是叫人從兒童時期起就接受那種腐朽的生活方式，適應這種環境，來衛護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杜威看來，學校的課程應是兒童的自發活動。兒童從這些活動中自然就學會了应付環境的知識與技能。活動既應是自發的，那麼教師就不應對它加以領導，只應尊重所謂兒童的“自由”，從旁予以協助而已。根據他這些謬說推論起來，設立學科、制定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編寫教科書，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把學生編成班級進行有組織的授課，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至於教師的主導作用之發揮，在杜威看來，不僅是

多余的，不可理解的，而且是大有妨碍的。他是这样武断地否定了有系统的完整的知識的教育作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杜威的这些主張是徹头徹尾反科学反理性主义的。買办資產階級代言人胡适在“歸國雜感”中說“……我奉劝列位办学切莫注意課程的完備……”就是杜威的应声虫。

杜威根据着这些理論，進一步主張應該把傳統的学校加以根本的改造，要改造得和現在社会一模一样。他說，学校應該“社会化”，或者說：“学校就是社会”。在社会上人們怎样生活，就叫兒童怎么活动。杜威認為这样的活动内容与兒童的自發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都是人类生物本性的表現。在“学校即社会”的口号下，杜威不僅在實質上干脆地取消了正規的学校，而且还借此使人們从兒童时期开始就去接受現存的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訓練。以便使他們成为資本家恭順的奴隸。他的“学校即社会”的實質，如果說明白了就應該是：“学校就是資本主义社会”。

在杜威以上的这些謬論的基礎之上，就產生出“葛雷制”“道尔顿制”及“設計教学法”等等奇怪的花招來。

馬列主义教育学告訴我們，为了要使青年一代成为全面發展的人，掌握系統的科学知識，就必须利用学校的場所，本着一定的教学計劃，根据教学大綱与教科書，由有經驗的教师，利用班級授課的形式，領導着他們去逐步進行學習。顯然劳动人民掌握了系統的科学知識这种武器以后，是会用它來解除强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的，这对于反动的資產階級來說自然是極不利的，所以反动資產階級御用学者杜威就制出“兒童中心”“从做中学”“学校即社会”这一套反动的理論，來針对着前述的一系列正確的教学措施極力加以破坏，在實質上就是根本取消学校的作用。

上面我們已將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主要論点加以簡單敘述与批判。这些主要論点就是：“教育无目的”，“兒童中心主义”、“从做中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些論点与馬列主义教育学的論点有时是明目張胆地对立，有时則是以魚目混珠的形式，隱然相抗。但是从本質上看，馬列主义教育学与实用主义教育学二者之間是沒有任何共通之点的。从目的論到課程論到方法論，从理論基礎到具体措施，二者之間都存在着原則性的区别。这一点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的。

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过去在我國教育界所產生的实际影响

由于美帝國主义对于中國文化教育進行有計劃的毒化工作，由于中國反动的封建階級及買办資產階級的大力推廣，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產生了極其普遍而深入的惡毒影响，这些影响至今还嚴重地存在着并對於我們的文教事業發生着侵蝕的作用。因之，在初步明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动本質之后，進一步肅清其所產生的实际影响，乃是十分必要的。

現在我們就來看，这些实际影响是什么。

(甲) 实用主义教育的目的論所給予舊中國教育界的毒害

首先，杜威的教育无目的的主張就曾經在我國產生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九年中國第五屆全國教育联合会通过決議，建議教育部“廢除教育宗旨，宣傳教育本义”。一九二

二年北洋軍閥政府果然采取了这个建議，（其中也还有美國資產階級教育家孟祿的預謀）就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令”，实行与美國學制完全一致的所謂新學制。不規定教育宗旨，于是教育无目的的思想便在中國得到了立法上的根据。胡适当时对“新學制”所作說明，就是支持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教育制度的明顯証据。

对于教育目的論这个教育上的头等重要課題被法令形式，被教育家們的決議式形加以武断地否定之后，就使混乱現象統治了整个教育界。这样就給各种反动教育學說大开方便之門。不但杜威胡适的教育思想可以暢銷，就連希特拉式的教育訓練和封建复古的梁漱溟思想也有了市場。因为教育既然无目的，那么教育究竟怎么办才好也就无所謂了。在学校制度上，模仿美國的固然好，模仿德國日本法國的也不能算錯，在設立課程上特别是在舊日大学的課程上也无須乎一致，誰願开什么課就开什么課，同一課程誰願怎么講就怎么講，完全抄西洋的固然时髦，一味講舊中國的也有人贊成，或者自己杜撰一套只要能够标新立異有人捧場，也不能算錯。在教学方法上也是应有尽有，海爾巴特的五段教學法、巴克赫斯特的道爾頓制、克伯屈的設計教學法、華虛朋的文納特卡制，还有德可樂利的、蒙台梭利的、凱兴斯坦納的、从北歐的到南歐的；从大陸的到英美的；这种种新舊花样几乎也都在中國試行过甚至推廣过。同时也还有很多人什么花样也不管，一直奉行着“先生講学生听”的老办法。究竟算誰的对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其实既然教育无目的，办教育是无所謂，那也就无法說出誰有理來。說到設立學校也是如此。究竟應該設些什么學校，什么學校應該設多少，設在什么地方？这些也就沒有一定的标准。学校內部制度也是随便怎样都可以，什么校長制、委員制、学分制、分科制、彈性升級制、选科制、廢除考試制、導師制，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制度，既可任行其一，也可并行不悖。反正都无所謂。以上种种便是舊中國教育的一片混乱相。这种混乱現象固然是帝國主义对于半殖民地中國侵略的反映，而胡适傳播实用主义思想实在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造成这样一片混乱相是与反动統治階級絕對有利的。因为他們名义上办了教育，而实际不讓受教育者得到真正的教育。何况，在这样一片混乱現象下，封建的買办的法西斯的貨色都可源源販运并繼續保存。这样就產生了冲淡乃至扼殺革命的作用，反动統治階級自然是極端欢迎的。所以胡适在“从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学”一文中說：“近年中國的教会学校，漸漸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學風……”这就是为反动教育張目的明証。

（乙）兒童本位思想的流毒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給予中國教育界另一普遍而惡劣的影响便是兒童本位主义的教育思想的泛濫。

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对内政綱第十三項就明白規定着要“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教育”。后来于一九二九年頒行的“小学課程暫行标准”也明白提出要“完成兒童本位教育”并且也確实在全部課程标准中貫徹着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在过去的一些小学及幼兒園中是充分貫徹了的，其典型代表就是陈鶴琴先生所提倡的“活教育”。在“活教育”的兒童中心的原則之下，在尊重兒童自發活動的原則之下，教师只处于第三者的輔助的地位，听任兒童自由活动。例如：教师周三台說：“上圖画課兒童愛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兒童画只蘋果的顏色是黑的話，也就讓他去”，

另一个教师鍾茵說：“‘活教育’給我的最大影响是三大法宝，教我們逢事要‘忍耐’，孩子脾气坏就讓他坏，好强就讓他好强，女孩子忍耐就忍耐一点吧”！

其实，不僅小学幼兒園如此。解放前中國各級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着这种精神的，有的甚至比以上的情形还嚴重得多。如过去北京、上海的許多大学上課随随便便，不願上就可以不上，上了不爱听就可以不听，甚至有的学生一註了册就可以不上課，結果到四年一样可以拿到文憑。說起來是“發揮自由研究”的精神，而实际上則是先生騙学生，学生騙先生。

虽然在这样的一些学校中，青年及兒童們不但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他們还会养成虛伪、欺騙、放肆、豪夺等不良的甚至恶劣的品質，使人安于帝國主义的、封建的、買办的法西斯統治，習慣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活秩序。但是假如誰要加以反对的話，那么，“不懂教育”“昧于教育本义”“違背兒童本位的原則”“忽視兒童兴趣”等一系列的責难便会加到誰的头上。

(丙) 从取消課程到取消学校

杜威說：“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事实上，舊中國有些自称办新教育的就是按着杜威的这个原則办事的，前面所說的陈鶴琴先生从前所办的“活教育”就是如此。这样做的結果不僅取消了学校中的課程，而且也在实际上取消了学校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生活教育”所起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陶先生把杜威前面所說的兩句話顛倒过來說：“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陶先生不僅說說而已，而且在他自己所办的曉莊师范和山海工学团以及他的許多学生所办的教育机关都是認真地这样做的”。当然，陶先生在政治上进步的，他的某些教育主張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的情况下，也是有他的積極意义，到晚年他更加靠近共產党，更加进步，但是从他的某些教育思想來看，也是应当予以批判的。

接受杜威这种教育思想的另一种表現是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反动东西，尽量往学校里搬，把学校作为直接的公开的訓練反动統治階級順民的工具。試看解放前的反动的保甲組織、市鄉政府組織，不是整个兒搬到学校里去了么？所謂設備比較完备的学校不是在竭力模仿杜威式的学校把社会上一切机构，尽量往学校里搬么？为什么他們都这样做呢？他們所依据的原則是什么呢？答复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丁) 其他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学不僅以其理論原則來影响我們，而且还以成套的具体办法對我們進行毒害，例如，設計教学法、道尔頓制、葛雷制、彈性升級制、自学輔導制等等都曾在中國許許多多地方流行过。很多学校都以能够实行这些方法为“进步”，条件不够的也尽量采取其一部分。以表示不甘“落后”。而实行这些办法的結果是什么呢？总的說來，它們是学生程度的降低，科学体系的被破坏，理論与实际的分家，毒害現象的加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給予舊中國教育界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在这里不再一一敘述了。

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今天的表現

解放以來，教育工作者在党的关怀与教育下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假若誰要以为上

面所說的種種情況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今天它們都已經無影無蹤了，那麼它就未免太天真了。因為，我們決不可能設想，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三十多年來給中國教育界的影響，會隨著蔣匪幫的失敗也退出了大陸，或者它們會在解放後的短短幾年內自然而然地從我們的頭腦中都洗刷干淨。凡是這樣想的人就是不懂得思想改造的艱巨性與複雜性，也是對於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性深刻性沒有領會，因而右傾麻痺失去警惕。當然，必須承認，解放幾年來我們絕大多數的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的轉變是巨大而顯著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在我們今天的不少的教育工作者的頭腦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過他們有時以明顯的原來的形式表現出來，有時卻以隱蔽的偽裝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我們今天各級各類學校都是要培養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新人，馬列主義教育學這樣告訴我們，政府也這樣指示我們，但是事實上我們却有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對於這個目的不理解，也不注意去鑽研並進而把它貫徹在自己的工作中去。以致學生負擔過重，健康情況不好，政治思想教育薄弱，最後影響到教育質量不高，這幾乎成為各級學校中曾經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嚴重問題。我們所有高等學校及中等技術學校的專業都有很明確而具體的培養目標。所有在這些學校里工作的人員都應本着這個明確具體的培養目標而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圍繞着這一中心而進行，並時時注意對學生進行專業思想教育。但是有些教師卻不管這些，每一個科目每一堂課都應有其一定的教學目標，然後教學工作才好進行，教學效果才好平衡，但是有少數教師仍不管這些，只管照本宣科或不著邊際地誇誇其談。最重要的，在今天各級各類學校都應使學生對於共產主義的方向有明確而堅定的信心，使其為準備完成國家的一個接着一個的五年計劃而努力，這是我們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對於這項工作我們是否人人都注意做了呢？事實上教學工作脫離政治的傾向有時仍然可以發現。有人誤解“技術決定一切”以為“政治是空道理技術是真本錢”。有個別教師偏偏在學校規定的政治學習時間去搞別的工作。有極少數學生把政治課當“衛生課”，以為在這個時間里可以休息。象以上所舉的諸如此類的情形為什麼在今天還程度不等地存在呢？顯然，就是因為今天在我們一部分教育工作者的頭腦中“教育無目的”“為教育而教育”“教育脫離政治”的暗影仍然有時出現，這些暗影在抵抗着阻撓着我們對於馬列主義教育思想和國家文教政策法令精神的接受，使國家政策及政府指示不能徹底貫徹下去，使人民教育事業遭受到一定的損失。試想，我們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教建設幹部，却在某種程度受着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者杜威思想的影響，難道這樣情況是可以允許繼續存在下去的么？

在我們今天各級各類的學校里不僅都有明確的培養目標，而且還有政府統一頒布的教學計劃各科教學大綱和教科書，這是國家指導文件必須一致執行。為了切實執行這些國家文件，要求每一位教師制定自己的教學工作計劃或教學日曆，以便很勻稱地很有秩序地進行工作，在進行教學時我們是把講課作為教學的基本形式，因之以極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它。而在所有教育過程中必須依靠教師發揮主導作用，以上這些措施都是根據馬列主義教學而來的。而對於這些，我們是否都切實做到了呢？當然，一般都做到了。但仍有的少數教師對於教學計劃及教學大綱不重視，把教學計劃的頒布只當作是科目時間

表的变动，只作为排課表时的参考，并不認真鑽研全力貫徹。甚至对于教学大綱的执行有时抱着“那兒黑那兒住店”的思想，講到那里算那里，以致到学期終了往往贖下許多講不完，于是就赶急圖快偷工減料草草了事，或者就干脆停止、有头无尾。这些种种作法顯然都不能使学生对于本門課得到系統完整的知識。对于基本教学形式，有的教师并不認真鑽研嚴肅执行。顯然，这就是因为在那些人头脑中占据地位的不完全是馬列主义教育思想，而是还有不少“兒童本位”“自由主义”“适应环境”“尊重学生自發活动”等变相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作怪。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在我們今天教育工作者中間的局部表現还并不以上述者为限。但是只就以上所說的这些來看，已經足够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了。因为这些情况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不管你是否系統地學習过实用主义教育学，也不管你是否知道这些教育学上的名詞和術語，也不管你是否知道杜威胡适的名字，但是由于种种直接間接的非无產階級思想影响，你都可能甚至于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和不同形式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而且这种思想影响在今天还以种种不同形式表現出來。我們就應該按照周总理“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所指示的三条道路，努力改造自己。

从以上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馬列主义教育思想在實質上是处于絕對对立的地位的。但是这些狡猾奸毒的实用主义者在反对馬列主义时往往披上“科学”的反封建的及种种形式的外衣來遮盖他的反动本質。今天作为一个文教工作者，为了尽快地掌握馬列主义教育思想，并以之作为指導我們工作的原則，就必须与过去曾經現在还繼續給我們教育事業以危害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展开不調和的斗争，揭露它的反动本質，把它徹底消滅干淨，期使我們社会主义的文教建設工作能以順利地迅速地向前進行，使我們中國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設能以早日实现。这是我們每个教育工作者所应積極完成的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务。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批判

李 化 方

所謂“理性主義”

梁漱溟是子承父志^①，以維護“聖道”自居，嘗說：“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鄉村建設理論”，以下簡稱“理論”，第374頁）。因而人笑之為“梁聖人”。既是“聖人”，當然有一套治國安邦的“理論”，這就是梁漱溟所著的“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這套“理論”，自認為是指出了中國應當努力的前途。什麼前途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所謂“理性主義”。

但我們必須首先指出梁漱溟的“理性主義”，並不同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主義。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主義，在當時還具有反封建的革命作用，它是為資產階級掃清道路。如關於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這一切都受到無情的批判。誠如恩格斯所說：“一切以前的社會形式及國家形式，一切傳統的观念，都被認為是不合理的东西，而一切過去的事情，只值得的憫恤與鄙視。現在呢？曙光第一次出現了，理性王國來臨了”。“這個理性的王國，不是別的，正是理想的資產階級的王國”^②。而梁漱溟所說的“理性主義”，恰好與此相反，不是反封建，而是擁護封建社會的各種生活制度及一切傳統觀念。所以梁漱溟的“理性主義”，不是資產階級的王國，而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王國。

梁漱溟為說明他的“理性主義”，曾為“理性”下了一個定義。他說：“理性”就是“倫理情誼”，而為人類造詣最高的文化。它“始於家庭，乃更推廣之於社會生活，國家生活。君與臣、官與民、比於父母與兒女之關係，東家伙計、師傅徒弟、社會上一切朋友同儕，比於兄弟或父子之關係。倫理上任何一方皆有其應盡之義務，倫理關係，即表示一種義務關係”（“理論”第117頁）。梁漱溟的“理性主義”是想將家庭的倫理關係，推廣至於社會生活，國家生活，而變為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這樣一來，倫理情誼就成為社會構造的基礎，而形成所謂“倫理本位社會”。這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臆造。我們知道，社會的基礎是生產關係，即經濟制度，而倫理情誼是觀念形態，屬於社會上層建築，不能將上層建築倒轉過來，作為社會的基礎。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③梁漱溟偏要將它們倒轉過來，頭腳倒置，僅就此

①梁漱溟之父梁濟，為清室遺老，因反對新文化、新青年，而於一九一八年投河自殺。梁濟自己說：他的死是為殉清、殉道。詳見蔡尚思著《中國傳統思想批判補編》。

②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第四——五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六三五頁。

說，已充分表現出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反動的本質。因為如果將社會人與人關係，都看成是倫理關係，都看成是義務關係，而不看成經濟關係，當然就沒有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如官與民），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如東與伙），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關係了（如地主與農民）。這些關係一經掩蔽，就可以愚昧農民，使之安分守己，供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任意壓迫與剝削，不起來反抗。梁漱溟的“倫理本位社會”，其反動的本質即在於此。

梁漱溟所說的“倫理情誼”是產生於封建社會，而形成封建道德。道德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沒有永恆不變的道德，道德又因階級地位的不同，而形成階級的道德觀念，所以道德又是有階級性的。“倫理情誼”是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用以統治人民的工具。然自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使中國經濟上發生了變化，因而也就破壞了這種道德，即破壞了梁漱溟所謂人類最高文化。梁漱溟看到了這種情況就大聲疾呼：“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無辦法”（“理論”第21頁）。梁漱溟所謂“失調”，正是動搖了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梁漱溟能不痛心疾首，而思有以恢復之，使之完整無缺，以便建立他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理想王國嗎！但梁漱溟為掩蓋他的封建主義的本質，卻披上理性主義的外衣，而向人民說教了。所以，梁漱溟的“理性主義”，就是道地的封建主義。

中國無階級的謬論

我們都知道，中國社會自從變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會以後，在階級關係方面已發生新的變化，這個新的變化的社會，不但存在着原來農民與地主的對立，而又產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包括中外的資產階級），這是具體存在的客觀實在，但梁漱溟死不承認這種客觀實在，不但承認中國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存在，而且也不承認中國的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存在，甚至認為中國自有了官吏制度和考試制度以後，早已不是封建社會了。他說：“中國只有一行一行的職業，而沒有兩面對立的階級，所以中國社會可稱為一種職業分立的社会。在此社會中，非無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對立之勢不成，斯不謂之階級社會耳”（“理論”第28頁）。梁漱溟既然認為中國無階級，當然也就沒有剝削。所以他又說：“現在許多人咒罵剝削，其實中國剝削尚遠，沒有秩序那能談到剝削”（“理論”第74頁）。梁漱溟在扭轉不過事實的時候，也承認階級剝削，但又曲解剝削。他說：“階級剝削為各社會通有的現象，歷史所必經過，即在被剝削一面亦不是絕對的受害……彼此又是互相依存，斷不能說誰破壞誰”（“理論”第7頁）。

梁漱溟閉着眼睛硬說中國社會無階級、無剝削，就有剝削也不是絕對受害，而是“互相依存”。地主不能離開農民，而農民也不能離開地主，究竟誰养活誰，那是不要爭辯的，若爭辯就喪失倫理情誼了。梁漱溟就是用這樣的魔術詞令，來掩蓋農村的剝削關係。而事實却是這樣：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耘地主的土地，則將收穫百分之五十以至百分之七、八十交給地主享用。地主不勞而獲，驕奢淫逸；農民終歲勤苦，不得溫飽，

这就是梁漱溟所謂“互相依存”和“倫理情誼”呀！

但还不止此，梁漱溟为掩盖農村的階級关系，而在詞句上面煞費苦心。如不称農村，而称鄉村；不称農民，而称为“鄉村居民”，并为后一名詞特別作了声明：“而特标鄉村居民，我以为‘有產’‘无產’是不适于拿來分別中國社会的”（“理論”第333頁）。我們知道，階級是根据財產地位來决定的，如在社会中不分別“有產”“无產”，那末階級关系就完全可以隱蔽起來。隱蔽了階級关系之后，“鄉村居民”就可以完全一样了。“占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占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雇農、中農及其他的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①这些人梁漱溟統謂之“鄉村居民”，並沒有什麼差別。

这样，階級在梁漱溟口中都化为烏有。由此梁漱溟得出“中國无革命”結論來（“理論”第32頁）。革命是一个階級打倒另一个階級，中國既无階級，那还会有革命呢？所以梁漱溟說：中國從來“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同前），現在呢？中國也沒有階級的存在，至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无產階級与資產階級的对立，農民階級与地主階級的对立，在梁漱溟則認為是人工制造的，实际上是沒有的。既然革命者与被革命者本身都不存在，那怎样革命呢？所以革命在梁漱溟口中也就消滅了。但是階級对立，革命势力，并不因为梁漱溟念一道符咒，就沒有了。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人民革命势力，仍然蓬勃發展起來。梁漱溟看到这种情况，就想建立一套“理論”來麻痹人民，这就是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是地主階級对農民的宣教師，以他的“理論”來解除農民革命思想的武裝，想从这一方面來消滅革命。梁漱溟曾認為中國大問題之一是“毒品”，我們認為梁漱溟这种宣教，比教人民吸食毒品还更惡毒。

一貫反共反人民

我們說到这里，就可以知道梁漱溟为什么極端仇視中國共產党了。梁漱溟虽然是个講“調和”的人，但对于共產党則表示誓不兩立。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的自序中曾說：他的“見地和主張，萌芽于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大半決定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而成熟于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并說：“这是我从對中國問題的煩悶而找出來的答案”。梁漱溟这种自白，很清楚地看到他这套反动的东西，是反对共產党（中國共產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是針對着中國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農民运动而產生的。在大革命的初期，由中國共產党所領導的農民革命运动澎湃發展，“在几个月內，以这一百万多農民会員为骨干，推动千百万農民羣众，在湖南進行了旋轉乾坤的大革命”。^②梁漱溟看到这种情况，則感到物伤其类的悲哀；后因大革命失敗，共產党轉入農村，革命仍然不断的高漲，更刺痛了梁漱溟的階級創伤。他煩悶是必然的。但为了階級利益終於找出答案而行动起来。他說：“要想消除共產党的農民运动，必須另有一种農民运动起來替代才可

^① 刘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② 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第九八頁。

以。我們的鄉村組織除了一方從地方保衛上抵禦共產黨外，還有一面就是我們這種運動實為中國農民運動的正軌，可以替代共產黨”（“理論”第280頁）。這是很坦白地說出，原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是為了“抵禦”“替代”共產黨啊！梁漱溟為了反共反人民見之于實際行動，就投靠封建軍閥韓復榘，先在河南汴村治學院，後來又在山東鄒平成立鄉村建設研究院，以反共反人民的理論，來欺騙青年。並在鄒平辦實驗院，設立鄉農學校，而麻醉和壓迫人民，他的所有經費，完全由韓復榘供給。^⑥並且毫不知恥地說：“軍閥若一旦高談鄉村建設，亦何嘗不就是鄉村運動者。所以結果彼我之界，實无从分”（“理論”第315頁）。這就是說梁漱溟韓復榘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立場上是毫無區別的。

據梁漱溟自己說，他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如果真是這樣，是因為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所以他反對；社會主義又比資本主義更進步，所以他更反對，越進步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反對也就越厲害。所以梁漱溟對於社會主義比對於資本主義的仇恨要大的多。他口里說反對資本主義卻從後門引進它的東西，如“設立銀行”，“流通金融”，“促進合作組織”等等（“理論”第401頁）。這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在梁漱溟所設計的“新社會”也是不可少的東西。並常引用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羅素、杜威、胡適等言論，作為自己理論的論證，但他反對社會主義則毫不留情。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者和建設者，所以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仇恨就越深越大。梁漱溟認為：中國大問題，第一是“毒品問題”，第二是“匪患問題”（“理論”第267—273頁）。他說：“自共產革命興，而土匪日以張，鄉村墟里日以毀”（“理論”第334頁）。並說：“如果鄉村沒有自衛的力量，簡直是與土匪、共產黨造機會”（“理論”第273頁）。且將共產黨與土匪同等看待，他又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其為害亦與土匪差不多”（“理論”第279頁）。梁漱溟為什麼這樣的誣蔑、仇恨中國共產黨呢？因為梁漱溟所要維護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還能苟延殘喘，若在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徹底消滅。所以他決心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勾當。

我們不要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看成是孤立的，地方性的東西，他不但依靠着地方軍閥韓復榘，並與蔣介石也有聯繫。當蔣介石正以武力圍剿共產黨時，梁漱溟為了配合這種武力圍剿，則用文化圍剿，他主張“不獨要消除共產分子，並要消除共產黨理論”（轉引蔡尚思著：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第43頁）。所以在梁漱溟的著作中，或明或暗，都充滿了謾罵中國共產黨和謾罵蘇聯的詞句。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就是用來“消除”共產黨理論的。這當然會得到反動頭子蔣介石的垂青，所以当韓復榘倒下以後，梁漱溟又直接投靠蔣介石，在重慶北碚又辦起他的鄉村建設學院來了。

究竟為誰服務

現在我們可以談一談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的具體設計了。據他自己說，他的鄉村建設是要改造中國社會。

⑥ 韓復榘：梁漱溟等所謂鄉村建設運動是為什麼人服務的，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報。

我們知道，中國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是帝國主义的統治，封建势力的压迫，這兩者又勾結起來剝削中國人民；另一方面是中國封建社会解体，產生了資本主义的因素，而中國的封建文化也随之發生变化，且由于无產階級的產生、壯大，担負起了时代革命的使命。梁漱溟所反对的，不是前者，而正是后者，所以他所打算建立的“新社会”，既不反对帝國主义，又不反对封建势力，并認為二者都不是革命对象。想在半殖民地的半封建这个社会的基础上，將鄉村机构重新組織一番，將鄉村居民納入組織之中，而建立一个“鄉村組織”就算是“新社会”了。

依照梁漱溟的設計，这个“鄉村組織”，“其內容配置分为四項：一、鄉長，二、鄉農学校，三、鄉公所，四、鄉民會議。这四項是組織中的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理論”第229頁）。这些机关，是以鄉農学校为主体，其余都是从鄉農学校發展出來的。鄉農学校校長任鄉長，为監督教訓机关；鄉農学校为設計机关；鄉農学校校董會組成鄉公所，为行政机关；鄉農学校的全体學員，組成鄉民會議，为立法机关。这就是梁漱溟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組織形式，美其名曰“政教合一”。但是这个“鄉村組織”，究竟为誰服务呢？我們說，它不僅是为地主階級服务，同时又为統治階級服务。梁漱溟認為真正生產者農民，都“蚩蚩为氓”，“愚蔽无知”，非有文化較高的人領導是不行的。在舊日鄉村中，有文化、有头臉的人除地主階級外还有什么人呢？所以鄉村的領導权自然要落到地主階級或依附地主階級的人的手中。这个鄉村組織的領導人既是校長，又是鄉長，給予了合法的地位，他對農民不但“作之師”（校長），而且还“作之君”（鄉長），这就將所有的農民都監視起來了。这个“鄉村組織”又是縣以下实际执行統治階級政令的机关。如要壯丁，要槍枝，派差派款及其他一切苛虐政令，均借此执行。这样梁漱溟的“鄉村組織”不但監視農民，并是执行反动政府的一切政令的。或者有人要問，这与蔣介石的保甲制度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們回答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梁漱溟的“鄉村組織”还多一道金箍咒。这就是以“倫理情誼”，“人生向上”，“向里用力，不与人爭”为“教化”，來麻痹農民。梁漱溟最担心的是“沒有方向的農民去瞎碰瞎摸”（“理論”第233頁）。也就是怕農民碰到摸到共產党那里去。所以一方面要地主監視農民，另方面又用“教化”麻痹農民，这就可以將農民捆的緊緊的，有“秩序”的被地主階級和統治階級宰割了。梁漱溟特別強調“社会秩序”其中用意也就在此。

可是農民究竟是能認識自己的利害的人，不会長期受騙，到怨毒已深，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搗毀鄉農学校，并打死校長。在这样情况下，梁漱溟也感到了“难处”說：“現在是我們动，他們（按指農民）不动，他們不惟不动，甚且因為我們动，反來和他們鬧得很不合适，几乎讓我們作不下去”。（“理論”附錄第3頁）。我們認為这是必然的結果。梁漱溟你为地主階級服务，你为統治階級——蔣介石、韓复榘服务，当然就是与農民为敌了。無論梁漱溟如何伪装，人民是会認清敌人的。由于以上这种說明，現在我們总可以認識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鄉村組織”是个什麼性質的东西了。

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并不止此，还要在鄉村中成立合作組織。并認為这个合作組織可为都市和鄉村的資金流通架起一道桥梁。据梁漱溟的觀察，中國都市現金充斥，鄉村現金枯竭，而不能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問題。“一方貧血，一方充血，血脉既不能自由流通，就是一个很大的病源”。（“理論”第382頁）。現在要从現金“充

血”的地方，引到現金“貧血”的地方。就是將都市銀行的現金，通過合作社的貸款，而引到農村中來。這樣一來，都市是與鄉村的問題都可以得解決了。但是這樣一來，梁漱溟又為買辦資產階級對農民直接剝削開辟一條道路；同時也為地主階級和富農增添一種剝削農民的憑借。我很清楚地知道，在反動政府時代，甘肅省大辦農村合作社，銀行貸款是要通過地主、富農之手，而地主、富農並不需要資金，他們將從銀行獲得貸款，以利息“加五”或“對斗子”而轉貸給農民，使銀行貸款變成了高利貸的高利貸。（參考拙著“甘肅農村調查”第57頁）。梁漱溟的辦法，在以前還只是為地主階級、統治階級服務，現在又為買辦資產階級服務了，但始終沒有給農民服務。隨着本文敘述的延長，梁漱溟服務的主子則不斷增加，除了地主階級之外，又有封建軍閥韓復榘以及反動統治階級的头子蔣介石，現在買辦資產階級也作梁漱溟的主子了，這還都是國內的。再看看梁漱溟國外的主子是什麼人吧？

梁漱溟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是不敢反抗的，而是採取一種奴顏婢膝的態度。帝國主義希望中國長期成為一個農業國家，梁漱溟就主張中國要以農立國。他這種主張，是仰承帝國主義的鼻息，而甘願作帝國主義的走狗。且厚顏無恥地說：“帝國主義對於‘農業’尚可放過我們一步”（如所謂“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理論”第375頁）。這就“給中國農業留下一點活動余地，真是很巧的事”。（“理論”第378頁）。“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就是一個小學生也知道，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想長期奴役中國人民，滅亡中國的口號。而梁漱溟則甘之如飴，認為是“真是很巧的事”。並引為自己的論證。若稍微有點愛國主義思想的人，也不至說出這樣無恥的話來。但梁漱溟還不止感謝日本帝國主義，而是感謝所有的帝國主義。你往下看：“帝國主義以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經濟手段，對於中國的競爭壓迫，杜絕了中國工商業的興起，使中國免于資本主義化，這真是非常慶幸之事，我願謝天謝地”（“理論”第378頁）。梁漱溟為什麼這樣的喪心病狂來感謝帝國主義呢？是因為他的愚蠢無知嗎？不是的，而他的目的則別有所在。他說：“這樣，才留給我們今天講鄉村建設的機會，要不然，象俄國那樣，形成一個半通不通的工業國家，最适宜於發生共產革命”（“理論”第378頁）。啊！梁漱溟寧願中國長期處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而不願中國共產黨革命，他仇恨共產黨，以致到了感謝帝國主義。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為保存這個社會基礎，就要支持它，而它也要依靠帝國主義而生存，所以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是不能分離的。地主階級的保鏢人梁漱溟，當然不反對帝國主義並為帝國主義服務了。我們說到這個地方，知道梁漱溟又多了一個主子——帝國主義。

雖然梁漱溟主張“農業中國、工業日本”，但不能一手遮蓋中國人民的耳目。為欺騙中國人民，也提出中國“工業化問題”（“理論”第432頁）。但是他的工業化是“從農業引發工業”。他說：“盡力於農業，其結果正是引發工業，並且我敢斷定中國工業的興起，只有這條道路”（“理論”第388頁）。那末怎麼引發呢？就是先生產農業上所需要的工業品，而逐漸推廣及其他；并先以合作方式經營工業，然後再向內地設立工廠，總之一句話：“工業向農村分散”（“理論”第391頁）。梁漱溟為什麼主張工業下鄉呢？他認為在都市不能與帝國主義競爭市場“要從競爭市場而收回市場是不行的”